

# 中国流动樊篱下农民工身份 龃龉之圈层研究

□ 张 晗 周恩毅 孙彦坤

**内容提要** 随着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横亘于城乡之间的户籍制度有所松动,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也应运而生。他们渐渐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生力军,并试图通过非农化实现其社会身份转变的目标。然而,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他们不仅遭遇到物质层面的障碍,而且还面临着制度与文化的樊篱,大面积出现诸如地位弱势、身份非法、称谓污名等现象。基于此,本文以社会圈层为视角,从流动人口的失范与现行制度的缺陷两方面,探析与研究农民工身份龃龉现象产生的原因,兼论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的处理策略:构建象征符号体系、完善身份转换机制、推行家庭式变迁模式,从而弱化农民工群体无序流动引起的负面效应,以促进城市化建设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 社会流动 农民工 社会身份 圈层理论

作者张晗,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公共管理专业研究生;周恩毅,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西安 710055)孙彦坤,中铁一局集团桥梁工程有限公司。(重庆 401121)

DOI:10.14167/j.zjss.2015.07.009

## 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农民工渐渐成为中国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的一种独特群体,他们既是城市化的产物,又是城市化阻滞的表现。而这种独特的现象直接折射出的是农民工社会身份与职业身份的分离状态,即身份龃龉。当这种“制度上的意外”逐渐地由于其不断变大而引起诸多方面关注的时候,对农民工身份融入在制度上的修正或转变就会变得不可避免。目前,对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社会学研究主要有四个视角:一是以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为视角,强调农民工融入城市需具备的社会资源;二是以社会排斥为视角,注重外部势力对农民工融入的阻碍;三是以社会认同为视角,探究城市归属感对农民工融入的作用;四是以社会距离为视角,揭示社会关系与社会结

构对农民工融入的限制(袁靖华,2011:60)。但是,相关研究却都忽略了推动农民工城市融入得以实现的身份转变的重要性。因而,寻求一种新的理论对农民工身份龃龉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剖析就显得尤为重要。

“圈层理论”最初是由德国经济学家杜能提出,用以描述工业生产布局,后经学者们的改造与补充,即将圈层理论运用于农民行为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比较突出的如下:施坚雅(1998)在其基层市场共同体假设中,明晰指出农民的活动圈层有市场圈、婚姻圈和交往圈。费孝通(1998)以“差序格局”代替圈层理论,着重描述农民的亲属圈(交往圈)。他认为乡土社会的人们奉守的是一种以己为中心,以血缘和亲缘为纽带的交往准则。邓大才(2009)则是基于小农社会化的路径与动力研究,提出农民

存在三种行为圈层,即市场圈、就业圈和投资圈。从上述内容不难看出,圈层理论的内容实际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研究圈层内部的关系;二是研究突破旧圈层、融入新圈层的过程;三是研究渗透圈层的外部力量(邓大才,2009:2)。可以说,圈层理论是群体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因此,本文将把圈层理论运用到农民工的研究中,对其身份龃龉进行原因剖析,以为农民工成功融入城市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 二、农民工身份龃龉的社会流动樊篱

在城市生活的环境中,农民工弱势群体像是生硬嵌入的群体,且渐变为令城市居民侧目的问题群体和防范群体。究其原因,农民工群体的固有思想、价值观与现行制度与文化的冲撞是“罪魁祸首”。因此,我们可从制度樊篱与文化樊篱两个方面去对农民工身份龃龉现象进行探究。

### (一) 制度樊篱

制度樊篱主要是指户籍制度及其建立在户籍制度上的包括就业制度、住房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对农民工身份成功转换的限制。事实上,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刚刚形成的时期,城市与乡村的二元结构是属于不同空间的区域性分割,农民工社会身份与职业身份是一致的。真正意义上出现农民工身份龃龉是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有所松动之后,此时的二元结构渐渐变为了“同一城市内部不同群体的社会性分割”(马西恒等,2008:20)。然而,这种社会性分割的形成本质上还是源于初期的二元户籍制度。首先,长期实行工农业“剪刀差”、优先发展工业等经济战略在户籍制度的影响下,直接促成城市居民在社会资源方面享有优越地位,间接引致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偏见与歧视。其次,从户籍制度“母体”衍生出的一系列制度,亦承袭二元划分的标准,集中体现在对城市与乡村居民的区别对待中,例如城市生活的高成本、就业岗位的限制、社会保障的缺失等,这严重阻碍了农民工由农村到城市的流动及社会身份由农民变为工人。再者,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对于农民工群体而言,这些制度无形之中提高了他们寻求正式制度解决自身需求问题的成本,从而限制其再社会化的诉求,大量选择“钟摆式”的社会迁徙。最后,城乡二元体制在非农领域的继续,间接

引致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身份认同变得模糊,使其游离于城市的边缘。

### (二) 文化樊篱

文化樊篱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其一为惯习的束缚。在中国乡土社会中,血缘与地缘对于农村家庭而言是尤为重要的。虽然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农村经济、文化都有所发展,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去除血缘、地缘关系对农民工的羁绊。反而,这些关系成为一种惯习,密切影响着人们生活与工作的方式,使期望通过非农化手段改变身份的农民工很难逾越,这也就是出现农民工社会流动内卷化现象的“根系”原因。正如布迪厄(1996)所描述的那样,惯习作为游戏中的王牌,不仅规定了参加者的本质属性,也决定了游戏的形式和结果。另外,对于城市居民而言,惯习的束缚也同样存在。城市居民长期处于天然的优势地位,并逐渐营造出适合其生活的文化氛围,使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大范围内接受异种文化。正如赵园媛(2009:148)总结的那样,“一种文化的持有者总会本能地对外来文化进行排斥,如果再加上物质优势带来的文化优越感,那么这些文化排斥就会变成一种文化歧视”。

其二为符号的障碍,主要指媒体对农民工群体真实需求的遮蔽。一方面,媒体为帮助农民工改变其弱势群体的地位,不断地加大报道力度与篇幅,为城市居民呈现农民工真实的生活状况。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媒体对农民工多采用他者陈述的叙事方式,无形中削弱了农民工向公众自我解释的权利。匮乏表达权利的结果就是农民工的集体“失声”。另一方面,媒体为满足城市居民的好奇心与获得自身的超额利润,往往会对农民工群体进行污名论述。这直接使农民工群体“演变”成了问题群体与防范群体,遭到城市居民的“集体排他”。更糟糕的是,农民工群体在城市居民表现出对其的歧视与偏见的态度时,本身产生自愿隔离的心理,认为自己的确是低人一等的。可以说,在他者陈述与污名论述的共同作用下,农民工的符号资本始终处于“赤贫”的状态,这就导致其身份转换变得更加困难。

## 三、基于社会圈层视域的原因解析

### (一) 城市居民之“紧缩圈层”<sup>①</sup>的排斥

按照周建国(2002)的观点,“紧缩圈层”是社会群体内必然存在的一种现象。所谓的“紧缩圈层”是指: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主体均与财富圈、权力圈、声望圈有关联,且试图进入各圈层的中心位置,成为财富、权力、声望的共同体。然而,由于社会资源有限性和先赋性的存在,处于各圈层中心地位的永远只是少数人,多数人处于远离中心的地带,甚至有少数人游离于圈层之外。加之,三种圈层在中国社会结构中更多时间呈现出交叉且重合度高的态势,直接导致财富、权力、声望圈层内向紧缩(周建国 2002: 99-100)。事实上,此圈层模式也确实实地存在于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中,具体表现在医疗、社保、住房等资源方面。诚然,这种“紧缩圈层”具备一定的正功能:激励农民工群体对社会资源的追求,整合农民工与城市居民间的社会关系。但现实中,由于农民工生活、工作区域的大部分资源长期被城市居民所占据,其地位已经完全处在圈外的地位。诚如安东尼·吉登斯的论述,“那些占据中心的人‘已经确立’了自身对资源的控制权,使他们得以维持自身与那些处于边缘区域的人的分化。(吉登斯, 1998: 222)”可以说,在城市居民“紧缩圈层”的排斥下,农民工的身份地位是无法仅在政策倾向下转变过来的。

(二) 农民工之亲情圈层的束缚、工具圈层内重组的失败

现代的乡土社会已经与费孝通描述的乡土社会“貌合神离”,呈现出半封闭的特征。长期生活在乡土社会中的农民也开始了从“不离土不离乡”到“离土不离乡”,再到“离土又离乡”的社会化进程。不过,自农民出生就伴随其成长的亲情圈层在乡村现代化进程中并没有消失不见,而是相当完整地或部分地复制到了城市生存空间。同时,一种新的圈层也伴随着农民工群体的出现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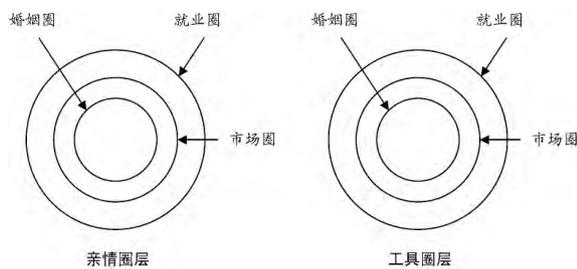


图1 两类圈层的内容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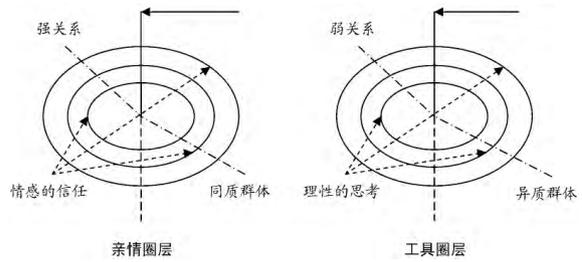


图2 两类圈层的结构示意图

形成,即所谓的工具圈层。也就是说,农民工在城镇化进程中会受到亲情圈层、工具圈层的影响。

从表象上看(见图1),两类圈层的组成内容是完全相同的,都包括婚姻圈、市场圈与就业圈。实质上,亲情圈层与工具圈层有着偌大的差别,具体如下(见图2):在圈层轴心方面,亲情圈层以血缘或地缘为轴心,工具圈层以业缘为轴心。在逻辑基点方面,亲情圈层以情感的信任为基点,工具圈层以理性的思考为基点。在圈层成员方面,亲情圈层内多为同质群体,工具圈层内多为异质群体。在关系强弱方面,亲情圈层依赖强关系,工具圈层依赖弱关系。需注意的是,从信息传递的角度看,强关系对于流动成员而言是弱的,而弱关系对其职业获得、资源获得等方面,均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对于“候鸟式”参与城市建设的农民工而言,亲情圈层是首要选择和依托,即初级社会关系(亲属关系)是最主要的联系。原因在于,在中国制度无法使信息分配均衡的前提下,基于血缘或地缘关系的人情交换是农民工获得信息与资源最可靠、最节省的方式。另外,这种“人情交换关系也具有非体制或反体制的特征”(渠敬东, 2001: 48)。相较于亲情圈层在农民工群体生活空间中的重要地位,工具圈层似乎是可有可无的。实则不然,工具圈层对于部分不满意度高的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亦是相当重要的。他们更多地依赖异质群体寻找资源与信息,并试图通过非农化手段成为城市居民中的一员。而且,他们实现身份转变的概率远远高于那些不满意度低或失范取向弱的农民工们。换言之,农民工对工具圈层依赖程度的偏低是农民工身份龃龉的一个原因。

除此之外,工具圈层内部的婚姻圈、市场圈和就业圈的关系重组失败也是农民工身份龃龉的一

个原因。从图1、图2可以看出,亲情圈层和工具圈层内都有婚姻圈、市场圈与就业圈。然而,从一定程度上分析,它们仍存在差异。在亲情圈层中,婚姻圈、市场圈与就业圈是以血缘或地缘为中轴由内向外依次推展而开的,且相互交织。而在工具圈层中,这三种圈的关系却不是简单程度的交织,沿袭的是一种从相互重叠变为相互排斥的脉络。从理论角度看,最初形态是相互重叠(A),即农民工的婚姻、交往与就业等活动间完全相关;最合理、最稳定的状态应该是相互交织(B),有交集但却不完全影响。但是,现实情况下的状态通常是相切(C)与相斥(D)。农民工往往发现自己被夹在相切圆的切线上,于是一点偏倚就可能因为自己的一个圆而把另一个圆牺牲掉,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农民工在农忙要返乡帮忙留守的家人,农闲又要返回工地工作,也就是所谓的“制度化半工半耕”。毋庸置疑,这亦是农民工经济身份无法与社会身份统一步调的原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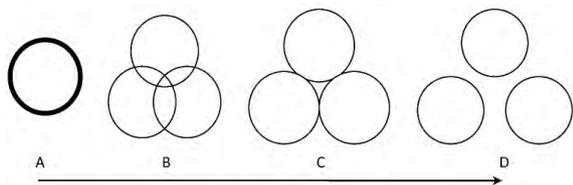


图3 工具圈层内圈的相互关系图

综上所述,农民工在城镇化进程中身份龃龉的现象是由城市居民的“紧缩圈层”的排斥与农民工的亲情圈层的束缚、工具圈层内重组的失败造成的。然而,从本质上看,上述现象更深层次上是由农民工自组织樊篱造成的。自组织樊篱主要涵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意愿缺失,大部分农民工没有强烈的进取意识,并没有大面积出现邓大才所提出的小农现代化动机——货币最大化,而更多地是寻求生存最大化。另一方面是能力不足,农民工群体多数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无法在充满竞争的市场中获得更多非农化机会,仅仅限于杂工、瓦工、管道工等职业。更为糟糕的是,失范取向高且素质偏低的农民工,会做出一些妨碍社会和谐发展的行为,引致城市居民的厌恶与歧视。

#### 四、农民工身份融入城市的处理策略

在认知与理解上述的现状与原因后,从理论层面提出农民工身份融入城市的处理策略就成为了当

务之急。然而在此之前,我们需明确一个观点:身份的融入并非“不是单方面要求社会群体的哪一方应该适应、变成另一方,而是突出彼此的平等、接纳、尊重和独立”(吕新萍 2010: 65)。因此,本文将视农民工身份融入过程为“一种双向度、有序的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行为”(2010: 65),从微观与宏观两大层面提出更科学更全面的建议。

##### (一) 微观层面: 两大群体的转变与互动

###### 1. 两大群体的转变

(1) 农民工融入意愿与能力的增强。从融入意愿来看,农民工的身份融入过程是其采取行动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且此过程有着一定的理由或意图,或因争取较好的酬劳、或因向往城市的生活等。但是对于今后是居住在城市还是“衣锦还乡”,农民工大部分是没有明确打算的,往往是抱着一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态度。因此,农民工若要达成社会身份与经济身份的一致,就必须要有强烈融入城市的意愿,同时不断心理暗示自己是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事实上,农民工群体在城市化建设中也确实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然,仅有融入意愿是远远不够的,农民工还需要相应的融入能力。从融入能力来看,农民工绝大多数是偏低的,而且个体间的能力又存在一定的差异。由此,农民工群体需要提升自身的谋划和转化能力。就谋划能力提升而言,农民工需要减少依赖同质人群(初级社会关系)获取社会资源的次数,多与异质人群相处、交流,提高与城市居民互动的频率,减少自身的“结构洞”<sup>②</sup>以获得社会资本。就转化能力提升而言,一方面,农民工需要经过一系列的技能培训与知识学习以获取大量的人力资本;另一方面,农民工必须要逐步养成符合城市要求的社会习惯、文明素养,积极承担一定城市管理责任与义务。

(2) 城市居民接纳意识的培育。虽然现代社会的基本趋势是从集体排他向个体排他转变,但是对农民工的排斥在相当程度上却依然是一种整体性、体制性的排斥(钱正荣 2010: 40)。而且“这种‘集体排他’在现实中也的确造成了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疏离甚至对立”(吕新萍 2010: 65),使农民工受到歧视与偏见,在心理层面阻碍着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因此,对于城市居民而言,首先要改变自己对农民工的偏见,以一种平等、尊重的态度去了

解他们。其次要纠正对农民工的歧视行为,诸如言语轻蔑、岗位抵制、人格侮辱等。再者,要认识到农民工群体为城市建设付出的力量,树立“补偿性正义”的意识。最后,认同农民工群体居住到社区,并通过社区帮助他们,例如社区活动号召农民工参加,特定假日向农民工发放物品,定期慰问农民工等。这些不仅能在表象上告知农民工他们渐渐被认同,还能在实质上帮助农民工完成由“空投型镶嵌”<sup>③</sup>向“在地化镶嵌”的转变。

### 2. 两大群体的互动

如前所述,农民工的身份融入不仅与农民工自身有关,亦与城市居民有关。因而,两大群体的互动结果将直接影响农民工身份融入的成功与失败。据此,笔者以“融入意愿”、“融入能力”为农民工群体的互动维度,并借用默顿的“偏见与歧视”<sup>④</sup>观点,以“偏见”、“歧视”为城市居民的互动维度,试着勾画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双向度互动下的融入趋势示意图(见图4)。以“融入意愿强、融入能力低”与“非歧视非偏见”为例,其互动结果是:农民工身份能够融入城市。特别指出:第一,农民工群体的四种组合是针对农民工个体而言的;而城市居民的四组态度组合强调的是整体水平。第二,“融入成功”、“融入失败”只是一种融入趋势,并不是直接结果。由图5不难发现,从“融入失败”到“融入成功”,其对应的市民化程度会经过逆市民化→边缘化→半市民化→准市民化→市民化五个阶段(胡杰成,2009:106-113)。总之,农民工与城市居民间双方的正向互动将会为农民工身份融入城市提供必要的社会和心理基础,并能为正式制度的变革营造出和睦相处的氛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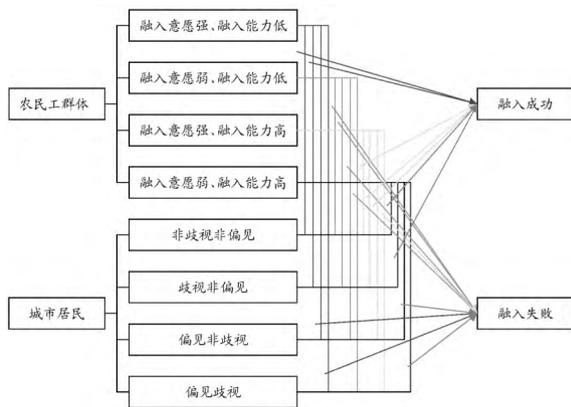


图4 双向度下农民工群体发融入趋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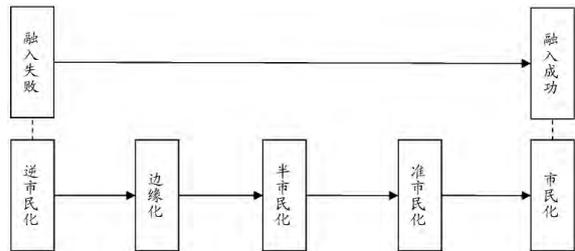


图5 融入结果与市民化程度的对应图

## (二) 宏观层面: 融入系统的完善

### 1. 构建象征符号体系

构建象征符号体系的目的是为了消除农民工的污名,具体措施有:其一,取缔“农民工”称谓。农民工进行跨文化、跨情境的行为活动,原本是为了谋求身份的改变。但是,自从被冠以“农民工”称谓后,因为部分失范取向较强的成员的不良行为,他们遭遇到的更多是歧视与偏见。同时,这一称谓也渐渐地被标签化、固定化。因此,取缔此称谓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当然,直接称呼农民工为城市人也是不恰当的。我们可以用“产业工人”、“新型合同工人”、“新市民”等称谓作为过渡。其二,发挥大众传播的作用。大众传播是当代社会中最可能完成除去农民工污名目标的社会机制,其强大的话语制造与意义再造能力,能够对农民工的生活境况进行“再次建构”,从而改变他们在城市居民心中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去除污名“不单纯是改变称谓的文字修辞策略”,或只是完全依赖于大众传播强大表述力的措施,而是一个被社会赋予合法性的进程(袁靖华,2011:67)。福柯曾指出话语生产总是依照一定程序受到控制、挑选、组织和分配的,并体现在社会权力网络整体运作的机制中。简单的说,除非农民工群体具有足够多的社会资源和影响力来左右城市居民对他们的态度,不然污名很难去除(管健,2006)。

### 2. 完善身份转换机制

农民工身份融入的过程不仅需要大众传播的表层整合,还需要政府机构、社会组织的内核推动。对于政府机构而言,推动农民工身份融入的进程需要着手三个方面。第一,改革相关的政策法规。在户籍管理方面,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制度。在就业政策方面,逐步向农民工开放先前限制的职位,规范农民工的劳动合同,并提供就业的信息与资源。在社会保障方面,建立农民工医疗

保障制度、完善农民工的劳动保险制度。在教育政策方面,为农民工的子女提供平等的学习机会,并给予一些补偿性的支助。在住房政策方面,创建一些经济适用房,以满足农民工的住房需求。在组织管理方面,将农民工吸纳到工会组织中去,但要注意吸纳在最初仅是小范围的、有选择的。

第二,积极看待农民工的融入行为。政府不可因为农民工大量的涌入对城市公共基础设施造成的压力,就认为农民工的流动行为是不可取的,进而强行设置屏障限制流动行为;而应该将农民工定位为城市发展的核心力量,相信他们融入能够给城市发展带来动力与潜力。基于这种理念,政府才能更好地为农民工身份融入提供积极的援助。

第三,倡导公平的社会流动。按照埃里克森和戈德索的观点,层次(阶级结构本身的层次位置)、继承(不同阶级位置上的资源与机会优势的传承)、区隔(制度与部门的障碍)、亲合(阶级位置间的亲合关系)是我们分析社会流动最基本的维度。从层次的角度来看,农民工处于农民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位置。从继承的角度来看,农民工的流动多依靠于先赋性因素,后致性因素基本上没有作用。从区隔的角度来看,农民工普遍受到户籍等二元制度的限制。从亲合的角度来看,农民工多数受到城市居民的歧视与厌恶。这也就是农民工的社会流动多为水平流动的原因。然而,垂直流动才是促进社会变化和发展的积极动力,是流动公平的表现。因此,政府机构需要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垂直流动的机会,基本思路如下:(1)规范上级阶层的代际流动;(2)提高后致性因素在社会流动中的比重;(3)宣传农民工群体的城市建设能力与成绩。

对于社会组织而言,首要任务是建立与农民工弱势群体息息相关的组织。在农民工人群逐渐增大的背景下,一方面农民工本身遭受到组织化程度低、维权意识薄弱、素质偏低等主体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号召力弱的本土工会也没有能力大范围地解决农民工的权益问题。因而急需社会组织参与到推动农民工身份融入的进程中。诚然,目前中国存在一些社会组织在帮助农民工群体实现权益,诸如海南的“外来工之家”博爱花卉广场、“外来工之家”金贸汽修城、“外来工之家”滨濂再生资源回收城等。然而,这些社会组织也遭受着制度环境(在

政策层面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角色定位不清晰)、文化环境(媒体舆论的曲解)、技术环境(资金、人力资源缺失)的约束。鉴于此,农民工社会组织的成立是需建立在如下基础上的:一是政府对相关法律进行修正,放宽农民工社会组织登记的条件;二是政府给予农民工组织相应的资金帮助;三是媒体对农民工群体的如实报道;四是社会精英参与到农民工组织的管理中。

### 3. 推行家庭式迁移模式

农民工的社会流动不仅仅是农民工在社会樊篱间的流动,也是家庭留守成员的流动。换言之,农民工完成身份转变的同时,(核心)家庭成员亦需实现身份的某种程度的转变。但在当代中国,农民工与家庭成员之间往往是长时间不生活在一起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农民工获取经济收入的最根本的目的——实现以血缘为羁绊的家庭的利益最大化存在着冲突。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工身份转变是需要考虑到其家庭成员身份转变的。否则,农民工身份融入城市的结果有可能会引致家庭内部层面的矛盾(以离婚为主要形式)。于此,推行家庭式迁移模式就成为了家庭身份一致转化的最优抉择。但在家庭迁移之前,农民工需注意以下几点,以确保家庭成员成功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其一,充分认识自己的工作要求,即是否有具备足够的技能、体能、心理能力来照顾自己的家人。其二,明晰自己的工作资源,即是否有足够的职业报酬满足家庭成员在城市的消耗,是否具备足够的自主性安排自身的生活。其三,认真考虑家庭要求(以配偶要求与子女问题为主要思考点),即家人是否愿意与自己共同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因此,在家庭迁移过程中,农民工应先有选择地带领个别家庭成员适应城市生活节奏与氛围,再逐步考虑家庭的整体迁入。

## 五、结论

以圈层理论来看,农民工在城市融入过程中由于制度与文化樊篱而呈现出的身份龃龉现象,是由城市居民的“紧缩圈层”的排斥与农民工的亲情圈层的束缚、工具圈层内重组的失败造成的。为解决农民工身份龃龉问题、推动他们成功融入城市,我们需要从宏微观两个层面的共同考虑。在微观层面,实现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转变与互

动;在宏观层面,完善农民工的融入制度。然而,农民工从身份龃龉变为身份一致(融入)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不是任何一个主体能独立完成的事。从时间维度来看,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历经逆市民化——边缘化——半市民化——准市民化——市民化;从系统角度来看,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其外部条件是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大众传媒、城市居民,内部核心是农民工群体。因此,运用相关系统理论知识模塑农民工身份融入系统以进行社会学的探究,将成为学界的一个研究途径和趋势。

#### 注释:

①周建国的“紧缩圈层”涵括“圈”与“层”两个层面。然而,笔者仅赞同其“紧缩圈”式的人际关系模式,其“层”的论述不予置评。因此,文章对紧缩圈层的运用不涉及“层”的含义。

②博纳指出,社会网络并不是围绕某一主体形成的网络,相反,与该主体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社会网络是先存的,社会网络决定着该主体的社会位置和行动。同时,在社会网络中,某个或某些个体只与特定的个体发生直接关系,而与其他个体并没有直接关系,后者就是一种关系隔断,即结构洞。

③空投型镶嵌是指农民工在城市社区时间较短;在地化镶嵌是指农民工精英长期生活在城市社区,且生活相对固定。详见周利敏(2007)。

④偏见态度与歧视行为有四种可能结合,即非偏见非歧视,非偏见歧视,偏见非歧视,偏见歧视。

#### 参考文献:

1.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三联书店1998年版。
2. 陈旭峰《农民工NGO何以可能——基于理论思考和个案观察的分析》,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版,第3期。
3. 邓大才《“圈层理论”与社会化小农——小农社会化的路径与动力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4. 范叶超、杨慧玲《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情境》,《黑河学刊》2011年第2期。
5.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6. 高勇《社会樊篱的流动——对结构变迁背景下代际流动的考察》,《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24期。
7. 管健《身份污名的建构与社会表征——以天津N辖域的农民工为例》,《青年研究》2006年第3期。
8. 胡杰成《农民工市民化研究——一种社会互构论的视野》,华中师范大学2009年版。
9. 黄颂、陈友华《略论当代西方社会分层中关于社会流动的思想》,《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2期。
10. 柯兰君、李汉林《都市里的村民——中国大城市

的流动人口》,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11. 李强著《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
12. 李全生《布迪厄的社会结构理论述评》,《济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13. 李树茁、杨绪松、费尔德曼等《中国乡城流动人口社会网络复杂性特征分析》,《市场与人口分析》2006年第2期。
14. 李裕平《我国当前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状况及努力方向》,《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8年第12期。
15. 梁新文《中国社会转型期城市农民工公民身份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09年版。
16. 林典《农民工NGO发展的制约因素分析》,学会2011年版,第11期。
17. 刘宏伟《政府在农民工社会流动中的作用研究》,广西师范学院2010年版。
18. 刘群《关于中国社会流动于低位获得的研究综述》,《理论与现代化》2007年第5期。
19. 吕新萍《从社会排斥到社会共融——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途径与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
20. 罗伯特·K·默顿著、林聚任等译《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三联书店2011年版。
21. 马西恒、董星《敦睦他者: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合之路——对上海市Y社区的个案考察》,《学海》2008年第2期。
22. 孟丽君《青岛城乡社会结构变迁中的社会流动研究》,中国海洋大学2010年版。
23. 皮埃尔·布迪厄《自由交流》,三联书店1996年版。
24. 钱正荣《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问题研究》,《湖北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25. 乔纳森·特纳著、邱泽奇等译《社会学理论的结构》,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
26. 渠敬东《生活世界中的关系强度——农村外来人口的生活轨迹》,载柯兰君、李汉林主编《都市里的村民——中国大城市的流动人口》,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27. 施坚雅《中国农村经济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28. 孙红国《浅析近代德国公民身份的发展轨迹》,《历史教学》2011年第10期。
29. 谭同学《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结合中的工具性圈层格局——基于桥田野经验的分析》,《开放时代》2009年第8期。
30. 陶传进《控制与支持:国家与社会间的两种独立关系研究——中国农村社会里的情形》,《管理世界》2008年第2期。
31. 王春光《农民工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地位的变化》,《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32. 王甫勤《社会流动与分配公平感研究》,复旦大学2010年版。
33. 王振卯《转型期中国城市社会流动中先赋性影响因素分析——以南京的实证调查为例》,《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34. 许欣欣著《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35. 严俊《西方公民身份理论探析》,上海师范大学2004年版。

36. 杨继绳《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7. 袁靖华《大众传媒的符号救济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基于符号资本的视角》,《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年第1期。

38. 张黎莉《家庭式迁移农民工工作特征和家庭特征的量表开发及其应用——基于浙江省的调研》,《财贸研究》2011年第2期。

39. 张宛丽《非制度因素与地位获得——兼论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1期。

40. 张雪琴《当代中国公民身份构建的原则与路径选择》,《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41. 张星《社会流动与中间阶层的壮大和发展》,《前沿》2005年第3期。

42. 翟学伟《中国人行动的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43. 赵园媛《从城乡文化差异看农民工的城市适应问题——由(乡土中国生育制度)所想到的》,《世纪桥》2009年第8期。

44. 周泓《杨柳青镇乡:地缘圈界与信仰圈层——兼论汉人社会圈层形态》,《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45. 周利敏《镶嵌与自主性: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非正式途径》,《安徽农业科学》2007年第33期。

46. 周建国《紧缩圈层结构论——一项中国人际关系的结构与功能分析》,《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2期。

47. 朱力《群体性偏见与歧视——农民工与市民的磨擦性互动》,《江海学刊》2001年第6期。

48. Brian J. Hutter(2003). *Social Identity, Inequality, and Conflict: Correction and Extension*. *Economics of Governance* 4: 261-267.

49. Chan Siu-shan(1993). *Migration and Mobility: Temporary Workers and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Rural China*. Hong Kong: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50. Colette van Laar, Belle Derks, Naomi Ellemers and Dennis Bleeker(2010). *Valuing Social Identity: Consequences for Motivation and Performance in Low-Status Group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66(3): 602-617.

51. Marvin Washington(2004). *Declining Legitimacy and Social Mobility: A Study of Why Colleges Left the NAIA for the NCAA*. *Studies of Mgt. & Org.* 34(4): 32-51.

52. Thomas Joseph Cieslak II, M. A.(2004). *Describing and Measuring the Athletic Identity Construct: Scal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责任编辑 徐东涛 秦 鼎